

澳門海洋文化的若干問題

黃鴻釗*

一、澳門是嶺南海洋文化的組成部分

海洋文化是一種泛文化意義和文化現象，是海洋生態環境所提供的對人們生活、生產、價值觀念、性格、習俗的、物質的、精神的總體文化現象和表現。人們從遠古時代起就開始與海洋打交道，創造了與海洋有關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它是人類與海洋有關的創造，包括器物制度和精神創造。構成海洋文化的兩個基本要素是“人”和“海”。海洋文化是人海互動的結果，是人的力量在海洋活動的產物和結果。

說到海洋文化，我們不禁想起西方通常按照“地理上的差別”，把世界文化劃分為三種類型：①乾燥的高地、草原和平原；此種類型以游牧民族為代表。他們漂泊的放牧，表現出一種野蠻的原始本性。②巨川大江灌溉的平原流域；此種類型以農耕民族為代表。他們以海作為陸地的天限，閉關自守使他們無法分享海洋所賦予的文明。③與海相連的海岸地區。此種類型以海洋民族為代表。他們以智慧和勇敢，走向大海，進行征服、掠奪和追逐利潤的商業。由此推論出西方海洋文明乃是人類文明的最高發展，以此來否定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這些論斷值得商榷。

海洋文化不是西方國家的專利，東方國家也有海洋文化，凡是有海岸線的國家都有海洋文化。而且除了某些內陸國家之外，許多國家的文化都不是單一的，就是說，往往是既有海洋文化，也有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另一方面，也不能簡單地把海洋文化與暴力擴張劃等號，西方國家的海洋文化往往表現為暴力擴張和殖民掠奪，但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則是和平友好的貿易往來。而西方某些人卻只看到海洋文化中的暴力和征服這一方面，而無視其他國家海洋文化中的和平貿易往來。也許這正是東西方海洋文化的區別所在。

中華領土遼闊，民族眾多。從西北到西南，有廣潤的高地和草原；在中原地區是江河橫貫的沃土；而東面的邊沿則是曲折漫長的海岸線和星羅棋佈的海島，不僅是一個大陸國家，還是一個海岸國家。中國有 18,000 公里的海岸線和 14,000 多公里的島岸線。早在舊石器時代，中國沿海的勞動人民就開始與海洋打交道，過着拾貝抓魚的漁獵生活。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國沿海的勞動人民就發明了風帆、舵、槳，開始駕舟出海。中華文明是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與沿海地區海洋文明的融合。

在國內諸地域文化中，嶺南文化別具一格。嶺南以五嶺¹與長江流域隔離開來，處於珠江中下游地區，它與長江流域的區別就是丘陵地形與亞熱帶氣候，既無黃河平原的肅穆嚴峻，也無長江流域的溫潤秀雅，而是一塊豐饒的經濟作物區。嶺南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嶺南地區是中國海洋文化的發祥地，古百越人是典型的海洋民族；嶺南地區的海洋文化積澱，對廣東地區的改革開放、發展貿易等有着重要的影響。南海神與天妃是中國沿海最大的兩位海神。北回歸線以南珠江流域及兩廣沿海的廣府文化，具有鮮明的商業性和向海外拓殖性，有開放和兼容的胸襟，有二千年長盛不衰的海外貿易等等，這是中國最典型的海洋文化形態。

由於嶺南是中國海上交通的發祥地，是中國由海路走向世界的前沿，又是中西文化的交匯地，因之，海洋文化成為了嶺南文化引領時代潮流的重要因素。嶺南地區的海上活動，以“海上絲綢之路”為主要途徑，構築了中外關係史的重要地位。嶺南海上對外貿易早就遍及東南亞，直至南亞次大陸地區。歷史上廣州始終是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廣州亦因海上絲路的起點而聞名全球。中國歷史上的大規模對外文化交流，都是以嶺南為主要樞紐。

*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澳門文化是嶺南海洋文化的組成部分。澳門本是香山縣孤懸海中的一個小島。其後，因西江堆積之泥沙，於澳門與大陸之間，沖積成一沙堤，遂將澳門與大陸相連，而成一半島。遠在五千年之前，澳門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南端，海島遍佈，島上海岸沙堤內側，背山面海，有古瀉湖和淡水河。這種環境十分適宜於古代先民的生活。廣闊灘塗帶來豐富的海洋生物，而且澳門位於珠江口西岸，鹹水和淡水相交，適合多種魚蝦生長。這裏的亞熱帶海洋性氣候，溫暖濕潤，島上草木叢生，四季長青，有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在這種情況下，澳門先民的經濟類型是漁獵和採集為主。1985年路環島黑沙發現五千年前新石器遺址，出土石器有石英、石芯，有溝礪石和打制礪石工具，此外還有陶片 5,000 多片，上有刻劃紋、席紋、條紋、編織紋多種。主要為紅陶，亦有若干白陶。所有陶片紋路風格均為波浪紋、水滴紋。² 這是海港文化的基本特色，說明五千年前澳門地區的先民主要從事漁獵生活。而且澳門新石器遺址出土文物與香山珠海南部的海島古文化完全相同。因此，澳門是典型的嶺南海洋文化。

二、澳門海洋文化的特點和意義

澳門海洋文化具有外向性、開放性和商品性的特徵。古代澳門人奮力向外發展，通向海洋，通向世界，從不故步自封，在古代封建王朝閉關自守時代，自發地走向海洋，搏擊風浪，以尋求發展。地處珠江三角洲南端的香山，很早就從事海舶貿易。澳門位於香山南面，珠江的出海口，在海舶貿易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1548年出版的明代嘉靖《香山縣誌》，曾多處記載香山澳門附近地區與海舶貿易的有關情況。³ 這些通蕃記載可以看出，至遲在元末或明初洪武年間，香山的海外貿易已經十分活躍。但這些全是違反政府禁令的走私活動，並往往與海盜行為相結合。因此常常遭到當局的嚴厲控制和打擊。但通蕃貿易的優厚利潤，仍使香山人趨之若鶩，無法禁絕。通蕃的島澳當時通稱為香山澳，它們可分為兩個海區，一是由九澳、大小橫琴、九星洲等組成的澳門海區；另一個是三灶山、烏沙海等組成的浪白海區。但當時澳門、浪白這些名字尚未出現。到了 1570 年代，據黃佐嘉靖年間編撰的《廣東通誌》指出：香山縣的浪白、濠鏡、十字門等是廣州地區沿海的舶口之一。⁴ 其中，濠鏡和十字門後來合稱為澳門。澳門由於地理位置上的原因，

比較浪白更方便於聯繫縣城和省城。

澳門在通蕃貿易時代，它也是外國朝貢的一條主要貢道。據嘉靖香山縣誌記載，洪武 26 年(1393 年)，彭豫任香山縣丞期間，政績斐然，深得民心。但後來一樁經過香山入京的外國貢品發生問題，彭豫受此案牽連。“時外裔物貢方物，自香山入京，典其事者失封緘。朝廷遣禦史按問。事連豫，其子啓願以身代，邑民皇皇，恐豫得重罰。會赦獲免，民大喜迎以歸。坐是不得遷。”⁵ 這一事件發生於 14 世紀末。當時到香山來的外國貢船很可能就是停泊在澳門海區(濠鏡和十字門)清人尤侗有一首外國竹枝詞《默德那》，似乎可以作為這一點的證明。他寫道：

香山濠鏡辨光芒，妙女兒幹進秘方。
最是同儕多意氣，鄭莊千里不齋糧。

尤侗在該詩題記中說：“回回識寶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正德中進女你兒幹、於永獻房中秘方。”⁶ 明武宗正德年間即 1506-1520 年，有阿拉伯國家的貢船停泊澳門，並向北京派出貢使。尤侗曾經參加編撰《明史》、《佛郎機傳》就出自他的手筆。他根據手頭的豐富資料，寫了一組《外國竹枝詞》、《默德那》是其中的一首。由此可見，澳門在 16 世紀初以前，就是一個通蕃貿易知名的舶口，有阿拉伯人在此貿易，並由此經廣州進京。

16 世紀 30 年代澳門正式開放為貿易港口，是其文化形成與發展的重要階段。明朝於 1535 年將市舶司移設澳門。從此，澳門成為通達海外的貿易港口，國際航路通暢。中國人從澳門出發，沿着這條漫長的貿易線，東北面與日本、琉球和菲律賓相通，西南面穿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可到達東南亞和南洋各國，直抵非洲東岸。再沿好望角北上，通往歐洲。他們的活動擴大了中國文化的影響。葡萄牙人在 16 世紀初，便在馬六甲向華僑商人調查中國的情況，1514 年葡人皮來資著《東方記》一書，談到中國情況時說：“除廣州港口之外，另有一港名濠鏡。”⁷ 說明他們未到中國之前，已經知道澳門這個地方了。

1557 年葡萄牙人入據澳門以後，大大推動了澳門海洋文化的發展，演變至今日，形成三大特點。

第一，它是外向型文化。海洋是澳門文化的搖籃，它的海港城市的地理環境，決定它要向外發展，向海洋發展，它的經濟和文化都是外向性的。在古代封建王朝閉關自守時代，澳門人自發地走向海洋，搏擊風浪，以尋求發展。早期澳門是一個漁民聚集和商賈互市之地，以後逐步成為出國留學或移民海外的口岸。澳門率先通過海洋走向世界；同時傾心接納來自五洲

四海的文化。澳門人接受外來文化較早，引進外來文化也較早。澳門人鄭瑪諾是近代中國前往歐洲留學第一人，容閱則是出國接受現代高等教育的代表人物。他們以及其後出國的人們都是吸收西方文化的先進代表。

第二，它是多元文化。開放的澳門成爲西方文化進入中國的孔道。西方文化如泉水般通過澳門湧入中國內地。由於澳門很早成爲第一個外國人的居留地，中外人們混雜而居，更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商人前來貿易，帶來了色彩斑斕的外國文化。促進東西方文化在澳門相互滲透。當時先後有歐、亞、非、美等洲大約 20 多個早期國家的商人到過澳門，他們長期在澳門相安共處，交融滙通，形成別具一格的多元混合文化，成爲澳門文化的一道特殊景觀。使澳門成爲古代罕見的多元文化滙聚的地方。造成這種多元文化共存的原因，大體上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多神觀的中國人向來採取宗教寬容態度。佔澳門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信奉多神，認爲多拜一個神，就是爭取多一個菩薩保佑，會對社會生活安定和幸福多一分保障。正是這種多神思想使之對外來上帝信仰抱有包容態度，並認爲上帝也不過是諸神之一而已。由於中國人帶頭寬容外國人的不同信仰，也就必然換來對方同樣的尊重。

二是天主教經過 16 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以後，其宗教專制主義和排擠打擊異教的做法已經有所改變，對不同的宗教信仰也比較寬容了。特別是天主教傳教士到海外傳教，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取得立足之地，因此在澳門也力求與信仰不同的中國人和平相處。

三是爲了維護這個早期貿易港的地位，也必須保護宗教文化自由。澳門作爲國際貿易港口，商人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爲了留住這些商人，保持港口的繁榮，管治當局就要尊重任何外國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習俗，這樣宗教文化自由開放就成爲澳門幾百年來的一貫傳統。

第三，它是休閒娛樂文化。博彩旅遊業現在是澳門龍頭產業，同樣也是澳門的特色文化。博彩這個東西是一柄雙刃劍，它有正面的效應，也有負面的效應。賭博作爲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已經在中國流傳了數千年。賭博是憑機運和策略促使財物所有權發生頻繁轉移，它並沒有造成財富的絲毫增值，卻養成了人們的僥倖和投機心理。而且賭博中無論輸贏，均以損人利己爲前提，勾心鬥角十分激烈，給社會造成無窮危害。但是賭博所含有的競爭性和娛樂性，會產生巨大的誘惑力量。現實生活中的人，凡是有好勝心、僥倖心和

斂財欲望的，往往會去賭一把，而這正是賭博至今得以存在的社會基礎。近年來特區政府在大力發展博彩業，同時也大力開發澳門旅遊資源，使它更具魅力，吸引更多遊客來這裏享受歐陸風情，而擺脫單純倚賴博彩作爲招徠手段。

以上是澳門海洋文化的三大特點。其中多元文化是最大的特點，也是最大的優點。澳門海洋文化作爲一個典範，向我們證明，東西方的文化不僅應當和平相處，而且完全可以做到和平相處，交融滙通。

澳門海洋文化具有現實意義。澳門開埠以後，通過海洋走向世界；同時傾心接納來自五洲四海的文化，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大的作用。開放的澳門成爲西方文化進入中國的橋樑。西方文化如泉水般通過澳門湧入國內，直接推動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許多西洋產品對中國的國計民生或社會時尚造成一定影響。此外，尚有西洋建築藝術、繪畫、音樂、語言文字、醫藥、物理、數學等等都相繼傳入中國。總之，在 16-19 世紀初，澳門是西學東漸的跳板和據點，是中西文化會通的前哨和中心。西學傳入許多新的科學知識，也帶來了追求經世致用的務實學風，以及嚴密的邏輯推理方法，對中國的文化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

澳門這個港口城市，也是中國新文化、新思潮的發源地之一。由於西方新文化的傳入，明朝就出現了一些改革家，如徐光啓、李之藻等人，他們通過各種渠道與澳門聯繫，企圖利用西洋科技富國強兵。近代中國一些愛國的、追求改革和革命的人士，也很重視澳門，並以澳門爲其活動舞台。澳門民主思潮的傳入，使香山成爲中國民主革命的搖籃。中國民主思潮之起源於南方，在澳門附近地區相繼湧現了孫中山、康有爲、梁啓超、鄭觀應、劉思復等一批革命家和思想家，實與澳門大有關係。所有這些，便產生了我們傾心探討澳門海洋文化的發展和影響的必要性。

澳門文化的歷史作用，還在於它是三角洲地區人民放眼世界的窗口，不斷向這裏傳送來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的信息，使人們大受啓迪。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新思想、新觀念通過澳門傳入內地，使各種革命和改革思潮十分活躍，成爲民主革命的故鄉，出現了一批志向高遠的思想家、革命家、實業家、科學家。

三、澳門海洋文化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澳門將可充分利用海洋文化優勢，繼

續發揮良好的橋樑作用，推進國際交流合作。其發展前景是十分美好的。

首先，澳門具有國際城市的優越條件。海洋文化造就它成爲一個國際貿易港口，內聯大陸，外通四海，推動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澳門經濟歷來是外向性的，企業產品 90% 以上供出口，其中一半以上輸往西歐各國，還有 30% 出口美國。事實上，澳門完全是一個對外貿易的加工區。

澳門又是國際化的都市，有廣泛的國際聯繫。它是近 30 個國際組織的成員；近 30 個國家在澳門設有領事；110 多個國家和地區與澳門有貿易關係；澳門參加了“國際關稅及貿易總同盟”，有 2,700 種產品享受歐洲共同市場的“普通優惠稅制”。這些有利條件，使得澳門近 30 年來對外貿易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澳門對外面向五大洲，對內則是連接珠三角西部廣大地區的橋樑。澳門與中國內地的經濟關係最爲密切。大陸資源豐富、市場廣濶、交通方便，是澳門工業發展的可靠後方。澳門的部分工業原料毛紗、布料和機器設備來自大陸，大部分的生活資料，如糧油食品、肉類、蔬菜水果等，均從大陸進口。澳門從 1978 年以後，逐步將部分電子產品和針織品的生產工序轉移至大陸生產，以利用廉價勞動力來降低成本。從 1988 年開始，澳門又立法許可輸入大量大陸勞工，爲擴大生產創造有利條件。而這裏所說的內地，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地區。澳門可以打造成爲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商務服務平台，可以利用地緣的有利條件，協助珠江三角洲尤其是粵西地區走向世界，把粵西地區的名優產品轉口到歐盟、葡語系國家和東南亞等地，粵西地區的企業也可以更好地利用澳門作爲聯絡海外的橋樑和窗口。澳門回歸以後，即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良好的進展。前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鏞上任半年，即率團出訪葡萄牙、法國、並前往歐盟總部，闡述澳門將建成經濟和文化交流的橋樑的構想。此後，他又陸續訪問亞洲和非洲多個國家並近訪廣東、廣西、浙江、江蘇、上海、重慶乃至內蒙古等地，推介澳門這個得天獨厚的平台。這種做法，澳門人稱之爲“遠交近融”方略。當然，澳門也有不可否認的缺點。目前澳門爲所處的地理和社會條件的限制，其經濟主要是中小企業，缺乏現代化大工業。小企業的長處是投資少，周轉快，十分機動靈活，容易適應國際市場的變化。澳門工業對外依賴性大，這一點，尤其表現在對香港和中國內地的依賴上面。澳門與香港的經濟關係密切。由於它需要通過香港進出口，同時還仰賴香港的資金和技術人才，甚至還依靠從香港轉來訂貨

單來發展工業生產。凡是規模較大的澳門企業，多數是由港商獨資，或港澳商人合資經營的。但這並不妨礙它在新的歷史時期發揮橋樑作用。

其次，澳門與台灣的關係可望成爲加強兩岸關係的紐帶。澳門與台灣長期具有經貿與文化往來，關係密切。根據台灣“財政部”統計處的統計，1983 年台澳貿易總額僅 140 萬美元，但到 1997 年已達 3.493 億美元，台灣是澳門重要的貿易夥伴。投資方面，沒有具體的統計數字，但可以肯定，台灣是繼祖國大陸、香港之後在澳門的第三大投資者。近年來，人員往來迅猛增加。據台灣官方的統計，1997 年，台澳人員往來達 53 萬多次，其中，台灣民眾到澳門 500,456 人次，澳門居民到台灣的達 35,692 人次，台灣當局核定在台灣定居的澳門民眾有 662 人。⁸ 台澳人員往來的實際人數，比上述數字肯定還要大得多。因爲還有不少台灣民眾是經香港轉赴澳門觀光旅遊的。與此同時，到台灣就學的澳門學生有增無減。入讀台灣的大專院校一直是澳門學生的首選地區。1994 年開始，台灣當局在澳門設立“赴台升大專考生入學試”考場。該年澳門考生大幅增加，達 651 人，比 1993 年增長 32.86%。1998 年，澳門學生報讀台灣大專院校的人數達 700 人，被錄取的學生約爲 420 人，而正式入讀的學生超過 250 人，這三項數字都超過歷史的最高紀錄，並且也是首次超過香港的同類數字。⁹ 台澳關係是兩岸關係的特殊組成部分。1995 年 12 月 8 日，耗資 10 億美元、歷時 6 年完成的澳門國際機場啓用後，澳門與台灣正式通航，雙方分別由澳門航空和台灣長榮、復興航空經營台澳航線，並且台澳飛機經由澳門可一機到底飛行兩岸。當日，澳門航空 NX-101 航班從上海飛至澳門，在澳門更改航班編號爲 NX-602 後於上午 9 時 19 分飛抵台灣桃園機場，原機改編號爲 NX-601 於下午 1 時 53 分從桃園機場飛返澳門，之後同一架民航班機經澳門一機到底飛往大陸班機再改編號爲 NX-001 直飛北京。台澳通航是兩岸關係發展中的大事。擁有 51% “中資”的澳門航空可以“換班號、不換班機”的方式，“一機到底”續航大陸，表明兩岸從此進入間接直航階段。

其次，澳門與台灣的關係可望成爲加強兩岸關係的紐帶。再次，澳門歸僑在國際交往中的助力也不容忽視。在澳門爲數 50 萬的人口中，7 萬餘人的歸僑，是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在澳門社會經濟文化中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尤其是 20 世紀 60 年代，因東南亞地區一些國家排華事件而來澳門定居的歸僑，由於其在國外艱難辛酸的淒慘經歷，來到澳門後刻苦耐勞，勤

奮創業，與澳門同胞和諧相處，共同為澳門的進步和發展貢獻力量。他們除了在從事各項事業中為澳門的建設出力之外，還在推進澳門文化建設方面做出了許多積極的貢獻。

澳門歸僑先後建立在本地了6個歸僑組織，它們是：澳門歸僑總會(1968年)、澳門黑貓體育會(1970年)、澳門緬華互助會(1971年)、柬埔寨華僑聯誼會(1975年，原名東華福利組)，以及澳門緬甸歸僑聯合總會(1992年)等。歸僑組織也是全球華僑網絡的一個重要群體。他們除了關注本身正當權益，還積極參與社會事務，自覺地推動澳門與原僑居地的聯絡。並根據其自身特有的特點和優勢，積極開展活動，推進澳門的對外經濟文化關係。2001年，歸僑總會在澳門舉行“華僑華人聚濠江聯誼大會”，以擴大聯誼、加強合作、共同發展、促進統一為主題展開討論。共有30多個國家的華僑代表，以及內地各省市華僑和僑務工作者近1,000人參加大會，場面盛大而隆重。2002年7月31日，歸僑總會又舉辦中華文化與和平統一研討會，有內地、台灣、香港和澳門的學者宣讀論文，研討交流。2004年12月1日，歸僑總會再次舉辦“華僑華人聚濠江聯誼大會”，有25個國家的華僑代表，以及內地、港澳和台灣的僑界代表500多人歡聚濠江。

與此同時，歸僑總會又大力推動澳門華僑與各國僑團組織互訪活動。2002年和2004年，澳門華僑代表團先後訪問印尼和柬埔寨等國，現任澳門特區行政長官、時任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安亦隨團前往，使得這些訪問增加了許多發展經濟與文化交流方面的實際內容。其中歸僑數達50,000人的緬甸華僑顯得尤其活躍。緬華互助會大力推動與內地、香港、台灣和緬甸和東南亞地區華僑的友好往來，多次派團訪問，或邀請來訪，或舉行研討會、聯歡會等等形式，不斷擴大澳門在海外的影響力。

最後，澳門成為葡語社會交流合作的平台。澳門土生葡人是海洋文化留下的特殊遺產。土生文化對澳門所有的精神文化、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影響非常明顯。尤其是澳門土生葡人對於加強同葡語國家的聯繫、開展文化交流、培養葡語人才等方面，更具有紐帶作用。

澳門歷史上同葡語國家和地區有着極其密切的關係，今後可以充分利用這個獨特的歷史優勢，繼續發揮橋樑作用，擔當起推進中國與葡語國家交流合作的基地和平台。澳門完全有可能發揮這個作用的。須知澳門有葡萄牙人居留400多年，一向與葡語國家保持着獨特的歷史聯繫。加之澳門有許多土生葡人，以及

曾經僑居巴西、莫桑比克、安哥拉和東帝汶等葡語國家的華僑和葡僑社群。葡語國家中有些人士，以前曾在澳門學習和工作過，他們現在本國擔任要職，同時仍同澳門保持着緊密聯繫。新中國成立後，把澳門作為培養葡語人才的基地，多次派人員到澳門學習葡語，這些人後來多數在葡語國家工作。此外葡語國家設在澳門的各種機構的人員，經常參與澳門的商務洽談、經濟研討、人員培訓，以及各項文化交流活動，協助葡語國家和中國的中小企業開闢溝通渠道，開展經濟合作。在葡語國家當中，葡萄牙與澳門關係特殊，向來是澳門最重要的投資者，截至2004年，累計其直接投資總額達27.66億元，佔澳門來投資總額的8.7%¹⁰，僅次於香港和內地，居第三位。葡資銀行在澳門金融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成為發鈔銀行，並且是世界性葡語金融網絡的一個重要端口，為葡語國家企業進行貿易結算、融資借貸和資金調撥等提供方便。以上諸方面的有利因素，說明澳門是能夠在中國同葡語國家對外經貿關係中發揮一定作用，為澳門充當交流合作平台奠定了基礎。

如今世界上共有8個使用葡語的國家，即葡萄牙、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比紹、佛得角、東帝汶、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國。此外尚有澳門和果阿等通用葡語的地區。他們分佈於歐、亞、非、美四大洲，人口總數達2億多。其中巴西是具有完整工業體系和較高經濟水平的大國，而其他國家則或有豐富的礦藏資源，或有潛力巨大的市場。同時這些國家都分別是所在地區經濟組織的成員，包括歐盟、南方共同市場、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西非國家共同體等。因此，中國與葡語國家發展經貿合作，必定會在這些區域經濟組織產生輻射作用。而且中國與亞非拉美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本身就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這種合作，必將有助於提高雙方國際經濟中的地位。2003年10月，首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在澳門成功舉辦。中國和7個葡語國家的部長級經貿官員，以及400多位企業家濟濟一堂，討論並確定了雙方加強經貿合作與交流的措施和方向，並且簽訂了《經貿合作行動綱領》。會後，在有關政府的支持下設立了常設秘書處，陸續開展了相關的跟進工作，進一步表明中國政府與葡語國家政府對經貿合作的高度重視。2004年7月，歐盟委員會在一份關於澳門2003年的年度報告中，特別對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及“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的召開十分重視，並表達了高度關注。¹¹自論壇舉辦以來，的一年多時間中，中國與

葡語國家的貿易額增長了 20% 以上。2005 年 12 月，溫家寶總理訪問里斯本期間，曾高度評價澳門在中國對外交往中所發揮的橋樑作用：“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萄牙交流的紐帶，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的平台，澳門的這種橋樑紐帶作用今後會得到進一步加強。……中國與葡萄牙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將會促進澳門與葡萄牙的合作。同時，我也相信，澳門與世

界各地的友好往來會得到進一步加強。”¹² 隨後中葡兩國總理簽署的加強雙邊關係聯合聲明中，明確指出：“中葡強調‘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對發展兩國機構和企業間經貿合作關係發揮的重要平台作用。”這是對澳門平台功能的正式肯定。

註釋：

- ¹ 嶺南即嶺表、嶺外，指五嶺以南地區。五嶺：大庾嶺、騎田嶺、都龐嶺、萌諸嶺、越城嶺等五嶺，位於湘、贛、粵、桂等省區邊境。嶺南包括廣東、廣西、海南、香港和澳門等省區，一般亦特指廣東。
- ² 陳振忠：《珠澳史前文化及其共同性》，載於《東南文化》，第 2 期，1998 年，第 115-116 頁。
- ³ 黃佐：《香山縣誌》，明嘉靖刻本，卷 1，風土誌，卷 8 雜誌。
- ⁴ 黃佐：《廣東通誌》，明嘉靖三十七年刻本，卷 66，《外誌》。
- ⁵ 黃佐：《香山縣誌》，明嘉靖刻本，卷 5，官師。又《康熙香山縣誌》卷 5 宦績誌，彭豫。
- ⁶ 尤侗：《西堂詩集》，《外國竹枝詞·默德那》。尤侗所寫的明武宗的生活逸事是有根據的。武宗荒淫無恥，築密室“豹房”淫樂。于永、女你兒幹等確有其人。（《明武宗外紀》寫道：“有言錦衣衛都督同知於永善陰道秘術，遂召入豹房，與語大悅。永色目人，進言回回女皙潤而嵯粲，大勝中土；時都督呂佐亦色目人，永矯旨索佐家回女善西域舞者，得 12 人以進，歌舞達晝夜。顧猶以為不足，乃諷上請召諸侯伯中故色目籍家婦人入內，駕言教舞，而擇其美者留之不令出。”又：“回回進女你兒幹。”這些記載無疑都是信而有徵的。又《明史》中也有于永獻房中秘方的記載：“（錢糧）自稱皇庶子，引樂工臧賢，回回人于永，及番僧以秘戲進，請於禁內建豹房新寺，恣聲伎為樂。”見毛奇齡：《明武宗外紀》，上海：神州國光社，1941 年，第 13-14 頁。又《明史》，卷 307，第 8636 頁，《錢糧傳》。又見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卷 81，《西戎·默德那》。
- ⁷ 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年，第 53 頁。
- ⁸ 台灣“陸委會”編印：《港澳月報》，第 75 期，1998 年 3 月 15 日，第 41 頁。
- ⁹ 見《華澳日報》，1998 年 9 月 11 日，第 1 版。
- ¹⁰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直接投資統計(2004)》，2005 年 11 月。
- ¹¹ 李炳康、江時學：《澳門平台發展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第 213 頁。
- ¹² 吳黎明、趙曉鍾：《溫家寶總理高度評價澳門的橋樑紐帶作用》，新華社里斯本 2005 年 12 月 9 日電。